《好逑传》英译史与中国形象的异域构建*

卢　静
(上海财经大学,上海 200433)

提　要:通过聚焦译者微观史,本文梳理早期中英文化交流史上的两位译者围绕《好逑传》英译实施的编译操控及其对"中国形象"的异域构建,旨在揭示翻译与"讲述中国故事"的渊源由来已久。同时,本文也提出历史、译者和译本的互动研究视角可挖掘《好逑传》英译史研究的另一层意义,即通过译者文化过滤的翻译选择和翻译策略了解"中国形象"在英国的历时建构历程,折射 18 – 19 世纪中英外交和文化交流的状态,从而充分发挥翻译学的跨学科研究优势。

关键词:微观史;译者研究《好逑传》;中国形象;翻译史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 0100(2019)06 – 0122 – 5
DOI 编码:10.16263/j.cnki.23 – 1071/h.2019.06.019

Hau Kiou Choaan and the Image of China from the 18th to the 19th Century in Britain

Lu Jing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Focusing on translator study and adopting the method of translation micro-history,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China-related translation practices by Percy and Davis, two of the earliest British translators; by so doing, the writer of the paper aims to have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ranslator manipulation and China image appropriation via the translation of *Hau Kiou Choaan* in particular. In the end,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interactive study of history, translators and translated versions can be expected to elevate translation studies to a new position, shedding light on more critical historical issues such as the negotiation of China image in Britain and Sino-British diplomacy.

Key words: micro-history; translator study; *Hau Kiou Choaan*; image of Chin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1　引言

皮姆(A. Pym)在其翻译史研究著作《翻译史研究方法》(*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中提出翻译史研究的"人性化"倾向,即分析一定文化身份的译者在翻译史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揭示其翻译决策与宏观历史、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关系(Pym 1998:35)。通过聚焦译者的"微观史"(micro-history),我们可以探析翻译过程中主客体间交融、对话甚而冲突的多元关系。

本文以首部进入英语世界的中文长篇小说——《好逑传》[①]的早期英译史为案例,将译者帕西(T. Percy)和戴维斯(J. F. Davis)的文学翻译置于译者中国故事的系统叙述这一更为宏大的历史和社会语境中,以揭示译者实施的文学翻译操控及其对"中国形象"的构建。本文认为,具有"人文化"和"微观化"特点的翻译史研究途径能建立译者个体翻译活动与宏观文化交流联接的纽带,而译者微观史的研究途径也能更有效揭示译者在译文文本各层面以各种表达形式发出的另一种声音并揭示其产生的多重因素。"译本和历史呈现互动的关系,即译本既是历史的产物,同时也是文化交流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唯有将译本和译者研究置于特定社会、文化和文学的多元体系内,并将其视为多元体系内含的子体系(a system of sys-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汉语小说英译母语—非母语译者词汇使用对比研究"(17YJC740094)和上海财经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201711011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电子邮箱:lujing@mail.shufe.edu.cn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tems)，才能以“更加客观的、科学的和历史的视角审视译本并如实描述译者风格”，体现译学研究更为重要的价值(卢静 2014: 20)。

2　英文首译与译者的“中国形象”诠释

17 到 18 世纪大批法国耶稣会士带回大量中国见闻的一手资料并描绘出一个历史悠久、物产丰富且和谐稳定的中国形象，符合当时欧洲启蒙运动革新保守帝制的要求，进而形成 18 世纪一度风靡欧洲的“中国热”(Chinoiserie)。但是，当时正处上升时期的英国却没有完全跟从欧洲流行的这股“中国热”。凭借其日益频繁的对华贸易，特别是东印度公司在中国广东沿海一带势力的深入，以商人群体为代表的英国人带回与法国耶稣会士迥异的中国故事，他们眼中的中国人“狡诈、残酷、落后，盲目偶像崇拜、热衷封建迷信并且闭关自守”(Ballaster 2005: 206)。可以说，在 18 世纪的英国人眼中中国形象主要是负面的。

1761 年，《好逑传》英译本首次在英国出版发行，当时并未获得很大反响，英国的《文学评论》(*Critical Review*)甚至认为这部小说是“最近几个月来我们读过的最乏味的作品”。《好逑传》“本来就不是中国的名著，介绍到欧洲纯属偶然，得不到佳评并不为怪”(吕世生 2013: 32)。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从译者、出版商和赞助人的角度梳理翻译选择，也许能得出一个不同的结论。帕西选择翻译《好逑传》主要是因为这部小说是一个完整的关于中国的长篇故事，不同于当时流行于欧洲的权威“中国百科”《中华帝国全志》中收录的“片段故事”，具有“独特性和真实性”。耶稣会士译介的短篇故事“不能满足西方读者欲了解中国长篇小说的好奇，亦不能说明中国作者是怎样进行长篇叙事的”，《好逑传》则更加栩栩如生、有血有肉地展示异国风土人情(Percy 1761: xi)。因此从译者选择角度看，《好逑传》成为其“中国叙述”的开端也并非历史偶然。除去译者选择，出版商和赞助人因素在《好逑传》英译本问世的过程中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1761 年《好逑传》英译本的出版商是伦敦书商多兹利(R. Dodsley)，曾经因出版印度格言集《人生箴言》(*The Oeconomy of Human Life*)获得巨大的商业成功。为继续挖掘带有异国情调的东方文化，多兹利成为帕西《好逑传》英译本的赞助人和出版商。《好逑传》的“中国基因”是出版商看好这部译作并提供赞助的最初原因，而原文宣扬的明教教义及其教化功能和道德理念则是根本原因。“正当诲淫诲盗小说故事充斥国内市场的时候，这本来自中国的小说，作为一本讲究道德的书，还有劝善惩恶的作用”，符合当时英国社会主流价值观，又迎合讲究异国情调的读者口味，兼道德教化和娱乐大众的双重功能于一身(同上: A3)。从译者、出版商和赞助人角度理解，《好逑传》在 18 世纪的英国获得译介并非纯粹意义上的偶然事件，小说的中国元素、教化作用与中国故事的开篇功能促成其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

翻译操控学派认为，翻译是实施文学改写多种手段中尤其见效的一种，因此，“翻译最终只能代表部分现实”，其“折射”现实的功能也使翻译改写成为历史上新观点和新文学流派的触媒(Asimakoulas 2009: 241)。从《好逑传》的编译体系和编译手段两方面解读帕西对译本的操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握其“中国形象”构建策略。一方面，帕西采取学术型的编译体系，弥补其不通中文的缺憾并树立其编译权威，大量引用来自欧洲的中国著述，包括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好逑传》英译本已不仅是一部文学译作，而且是首部英国版的“中国百科全书”。译本扉页指明，除《好逑传》小说译本，还包括: (1) 一部中国戏剧; (2) 中国谚语集; (3) 中国诗歌片段。此外，扉页上摘选一段选自《中华帝国全志》的法语，表达帕西的编译初衷和《好逑传》英译本的多元功能。

Il n'y a pas de meilleur moyen de s'instruire de la Chine, que par la Chine meme: car par la on est suir de ne se point tromper, dans la connoissance du genie et des usages de cette nation. //没有比通过中国人自己讲述中国故事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办法了，因为通过这种方式才能真正了解这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和生活习俗。

通过《好逑传》，帕西意在以合集形式给西方读者带来有关中国的种种信息，其中包括小说、戏剧、谚语和诗歌，以诠释不同于耶稣会士描绘的中国形象。帕西认为，作为一部全面反映中国文化的作品，《好逑传》是关于“诡异的”中国文化的一个样本(Percy 1761: xiv)，因此，帕西编译的显著特色是包含大量注释(annotations and notes)、有关中国的参考书目以及注释汇编(glossary)，以便为英国普通读者在异域中国的大海中导航。帕西的这种编辑手段也一直延续到他的第二部中国编述中，以至于《中国杂记》(1762)在很多方面“读来像是《好逑传》的拓展脚注，是帕西在《好逑传》编辑和研究基础上自然产生的后续作品”(Min 2010: 307 – 324)。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另一方面，通过翻译副文本的脚注形式，帕西也尝试对读者施加微妙的影响。帕西的译本中包含大量脚注，涵盖中国文化万象，但对其译本注释汇编条目进行初步定量统计后可以发现，条目显示出对中国性别文化的特别关注（index 中共计 15 条），借此对中国人的形象施加明显的“东方主义”式解读。在涉及中国女性的脚注中，帕西特别介绍中国的性别文化，如中国古代男尊女卑文化下，女孩在出生时被其父母淹死、女人裹小脚的习俗、未出嫁女子不能出闺阁等。译者甚至在有些地方加上明晰的点评，如“妇女地位如此不堪”“一个自诩文明的国度，在此方面竟和最野蛮、最落后的民族毫无二致”，进一步左右普通读者心目中的“中国形象”（Percy 1761: 129）。原文中的核心人物之一水冰心代表不畏强权、机智勇敢和冰清玉洁的文学形象，是符合中国礼教和传统道德的女性典范，而在女主角水冰心机智挫敌的一处情节中，译者帕西添加如下“反故事主旨”的脚注：The Chinese, who are the most subtle crafty people in the world, may naturally be supposed to esteem and admire subtlety and craft. 在该注释的结尾处，经译者的加工和操控，原文情节和人物转化成毁损中国文化的另一个利器（同上：129）。

通过《好逑传》的编译，帕西尝试引导读者将“诡异”与“中国形象”划等号，在充分挖掘英国普通读者对于东方文化一贯保有的猎奇心理的基础上，通过改写小说情节和添加主观性的译文注释勾勒出一个“反东方的故事”（anti-oriental tale）（Watt 2007: 95）。兼翻译和编辑双重身份的帕西在《好逑传》的编译过程中首次以第三人称（the editor）的姿态对译本的文化信息、章节编排和人物形象进行系统而有目的的操控，尝试引导英国读者建立一种有别于当时欧洲大陆形成的比较正面的“中国形象”的另类解读，这种通过翻译进行的有意操控也成为其后期“复兴英国传统文学”系列著述的“动力和铺垫之一”（同上）。

3　复译与戴维斯的“中国形象”构建策略

18 世纪帕西译介的系列中国故事虽然在英国国内并未获得理想的传播效果，却间接成为英国汉学萌芽的诱因之一。1783 年，英国东方学家威廉·琼斯（W. Jones）创立孟加拉亚洲学会，即后来的伦敦皇家亚洲学会（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London）。而继 1793 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后，一批英国传教士和商人出于功利目的掀起汉语学习高潮，至 19 世纪上半叶，早期英国汉学初露端倪。当时的英国汉学带有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与法国相对更加学术化的汉学研究不同，英国汉学自诞生之初就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和实用目的，主要服务于东印度公司和英国在华扩张以及传播基督教新教教旨。早期英国汉学家主要译介对象是各类信息密集型的实用文体，如选译《京报》（*Peking Gazette*），译介有关中国养蚕、种茶等行业秘密，作为业余爱好，他们也选译少量中国文学（Davis 1829）。19 世纪后，大量英国新教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教事业一开始就与列强的对华扩张结下不解之缘”，不少新教传教士任职于西方国家驻华使团或贸易公司（杨平 2008: 43）。随着中英贸易往来需求的不断加大，英国传教士和商人群体中产生首批“中国通”和职业译员，他们有丰富的在华经历，熟谙中国语言和文化：前者以马歇曼（J. Marshman）为代表，后者包括《好逑传》复译译者戴维斯。

在中英外交史上，戴维斯主要以第二任港督（1844 – 1848）的身份记入史册。从 1793 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到 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中英外交风起云涌，早期英国汉学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而配合其政治目的的译介活动往往“有鲜明的目的性”，且早期英国汉学家大都“对中国持负面态度”（St. Andre 2007: 6 – 7）。戴维斯等早期英国汉学家认为，文学翻译的对象主要是英国普通读者，因而与政治贸易类实用文本的翻译策略有所不同，前者更应符合英国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和普通大众的阅读习惯；在对待异域文学和他者文化的问题上，早期汉学家倾向于采取抹杀文化差别的归化翻译策略，经过修饰、加工，把通俗易懂而不包含任何语言和文化差异细节的翻译产品呈现给普通大众。与此同时，19 世纪走向职业化的英国汉学也要求汉英翻译实践必须有别于早期以帕西为代表的编译，从而彰显译作的合理性和真实性。

戴维斯在《好逑传》复译中采取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策略，其最终翻译产品代表社会历史语境“内化”于译者并由其翻译实践呈现的多元复杂性。区别于首译，复译的主要特点有以下 3 点：第一，复译不再延续帕西译本中音译加注为主的异化翻译，更多采用通顺流畅的归化翻译。戴维斯将标题译为：*The Fortunate Union, a Chinese Romance*. 在人物尊称、度量体制和其它涉及中国文化的特色词语的翻译中，戴维斯大都采取归化翻译，如将“老爷”“大人”译为 lordship, excellency，将“四五十里”“二十逾斤”译为 twelve or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fifteen miles，between twenty and thirty pounds，把“青衣少年”译为 a young man in the dress of a student. 在涉及中国古代一夫多妻的文化翻译中，帕西通过注释如实解释“妻/妾”之分，而戴维斯将中文的“妾”归化翻译为欧洲文化中的 mistress（情人）。第二，在小说篇章结构和章回叙事风格上，戴维斯则采用更忠实于原文的异化翻译策略，避免帕西译本对小说原有章回不合理的编排整合，遵循中文原著的章回安排，而且，他也忠实地翻译帕西译本中省略的全部章回目录和多数穿插于小说叙事中的诗词歌赋（宋丽娟 孙逊 2009：76－77），使复译更符合早期英国汉学发展的要求。

翻译规范理论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受操作规范（operational norm）制约，从语篇矩阵结构到具体译语选择无不遵从一定的模式，而后者的形成又取决于两种语言所属的文化权利关系。在《好逑传》早期译介过程中，两位译者均遵从处于强势的英语文化与语言规范而在翻译策略和方法应用方面表现出规律性特征，从而使译作达到译者既定的翻译目标。历时译者在《好逑传》翻译过程中采取迥异的翻译策略，译本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色，但究其实质，不同翻译策略都服务于通过文学翻译建构特定“中国形象”的目的，并且具有“劝善惩恶”功能的文学作品，包括来自异域的翻译文学，无一例外必须与当时英国主流价值观相符合。

将译作置于其诞生的宏大历史社会语境中，我们还可以深入解释复译译者的翻译立场和策略。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初日渐频繁的中英外交活动暴露出清末中国的没落和腐败，彻底结束早期由法国耶稣会士带来的理想中国形象。19 世纪上半叶戴维斯译介《好逑传》时，英国正值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全盛时期，这一时期英国迅速向外扩张，在“日不落帝国”的光环下建立庞大的殖民地。英国早期的汉学家群体也在此时代背景下产生，这一群体的诞生顺应英国对外贸易和殖民扩张的实际需求。为确保译本的准确性，戴维斯在《好逑传》的翻译过程中主要使用“通顺”翻译（fluent translation）策略，综合使用归化和异化两种翻译方法，前者多用来掩盖文化差异，而后者则旨在制造一种异域翻译的表象，如戴维斯对原文小说中特定叙事风格标记和章节结构的忠实保留，两种截然不同的翻译方法共同服务于译者文化观指导下的翻译目的。以戴维斯为代表的早期英国汉学家的身份多为外交官、商人或传教士，因此，作为“业余爱好”的文学翻译也主要服务于其组织、控制和传播中国信息这一目的。早期英国汉学家的文学翻译实践表达出较为明显的文化态度：文学翻译仅提供“窥探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窗口和学习语言的工具，而通顺翻译策略则可以使英国读者免受“低劣”的中国文化的污染（St. Andre 2007：32）。

4　译者微观史研究的现实意义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 Bourdieu）在其文化理论建构中指出，“个体行为动因或并不能看作其深思熟虑后的有意之举，而是受到其‘秉性’影响，后者则深深植根于个体最深层次的思维和信仰体系中”（Gouanvic 2014：30）。译者研究的兴起标志着研究者开始结合具体历史和社会语境思考译者境遇并解释其活动。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翻译史研究重点顺应“文化转向”趋势而相应发生一系列质的变化，如研究方法更重视自下而上的个体研究、研究兴趣投射到特定社会、文化的叙事结构对普通成员的影响，而考察重点也相应地由历史中的大人物转向普通社会成员。人类历史及翻译史中充满有趣的故事，而这些故事的挖掘、整理和阐释对于解释特定翻译产品、其主要译者、翻译代理人及代理机构的交互作用乃至更为宏大的翻译、历史和文化的互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翻译史的研究途径有望给翻译研究提供全新视角、促使其跨学科性的加强并能帮助翻译实践者解决棘手的现实问题（D’hulst 2001：22）；同时，翻译史研究途径中的“文化”和“个体”转向契合当代译学发展的重心之一，即译者中心途径。

近年来，译学研究对翻译代理人（包括译者）、翻译代理机构以及两者权利交互的关注显示出翻译研究逐渐走向社会和关注宏观语境的倾向，这些具有“弥散”（discursive）特性的社会因素也影响并制约整个翻译过程，尤其对译者的翻译决策施加决定性的影响。翻译从来不是在真空中产生，研究翻译必须研究其“诞生的历史”（Bassnett，Lefevere 1990：11）。因此，翻译研究必须在译本诞生的客观历史条件下考察译者、历史与社会的互动，在与译作生产紧密关联的语境中发现传统翻译研究易忽略的重大问题。

5　结束语

“随着我国文学经典研究的展开，翻译文学经典化问题也成为近年来我们关注的一个热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点。”(宋学智 2107:69) 当代典籍英译不仅应继续关注作品本身文学造诣突出而获得经典性的佳作,也应该独辟蹊径,选取具备译介研究“另类”意义的作品,如本文关注的明末清初的中国才子佳人小说《好逑传》,其本身在中国古典小说中算不上一颗璀璨的明珠,通过梳理其英译史和文化交流史可以挖掘在一定历史背景下的翻译和译者对译本的重构及背后隐含的国家形象建构策略。本文通过宏观历史语境与微观历史主体两者的互动研究,聚焦中英外交史和“中国形象”在西方的建构等重大问题,从而极大地丰富和扩充对 18 世纪至 19 世纪《好逑传》英译史研究的传统意义。可以预见,研究微观史内化于个体形成的译者惯习将成为翻译史研究的有效途径之一,其意义在于“把握翻译活动的本质,建立翻译的历史观”,从而“扩大译学研究对相关学科的影响力”(许钧 2014:2)。

注释

①《好逑传》是明末清初的中国才子佳人学说。

参考文献

卢　静. 历时视阈下的译者风格研究——语料库辅助下的《聊斋志异》英译本调查 [J]. 外国语, 2014(4). ‖ Lu, J. A Diachronic Study on Translator Style: A Corpus-assisted Investigation into the English Versions of *Liao Zhai Zhi Yi* [J]. *Foreign Languages*, 2014(4).

吕世生. 18 世纪以来“走出去”的中国文学翻译改写模式 [J]. 中国翻译, 2013(5). ‖ Lv, S.-S. The Rewriting Model of the “Going-Out” Chinese Literary Translation since the 18th Century [J].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2013(5).

名教中人. 好逑传 [M].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5. ‖ Anonymity. *Hao Qiu Zhuan* [M]. Hefei: Anhu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5.

宋丽娟　孙 逊. 《好逑传》英译本版本研究——以帕西译本和德庇时译本为中心 [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5). ‖ Song, L.-J., Sun, X. A Study of the English Versions of *Hau Kiou Choaan*: Focusing upon Percy's Version and Davis' Version [J]. *Journal of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09(5).

宋学智. 翻译文学经典研究中的问题与思考 [J]. 外语学刊, 2017(1). ‖ Song, X.-Z. Problems and Reflection in the Research of Translated Literary Canons [J]. *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2017(1).

许　钧. 直面历史、关注现实——关于新时期翻译研究的两点建议 [J]. 外国语, 2014(3). ‖ Xu, J. Face History and Pay Attention to Reality: Two Suggestions on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New Period [J]. *Foreign Languages*, 2014(3).

杨　平. 评西方传教士《论语》翻译的基督教化倾向 [J]. 人文杂志, 2008(2). ‖ Yang, P. On Christianization Tendency i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Analects* by Western Missionaries [J]. *Journal of Humanities*, 2008(2).

Asimakoulas, D. Rewriting [A]. In: Baker, M., Saldanha, G. (Eds.), *Routledge Encyclopa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C].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Ballaster, R. *Fabulous Orients*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Bassnett, S., Lefevere, A.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M]. New York: Pinter, 1990.

Davis, J. F. *The Fortunate Union, a Romance,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Original, with Notes and Illustrations: To Which Is Added, a Chinese Tragedy* [M]. London: Printed for the Oriental Translation Fund, and Sold by J. Murray, 1829.

D'hulst, L. Translation History [A]. In: Gambier, Y., Doorslaer, L. V. (Eds.),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Studies*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10.

Gouanvic, J. Is Habitus as Conceived by Pierre Bourdieu Soluable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 In: Vorderobermeier, G. M. (Ed.), *Remapping Habitu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C]. New York: Rodopi, 2014.

Min, E. K. Thomas Percy's Chinese Miscellanies and the Reliques of Ancient English Poetry (1765) [J].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2010(3).

Percy, T. *Hau Kiou Choaan, or the Pleasing History* [M]. London: R. and J. Dodsley, 1761.

Pym, A. *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 [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8.

St. Andre, J. 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Sinology and Changes in Translation Practice [J].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2007(2).

Watt, J. Thomas Percy, China, and the Gothic [J]. *The Eighteenth Century*, 2007(2).

定稿日期: 2019-10-20　　【责任编辑　谢　群】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